

中国基督教合一的历史进程

段琦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基督教合一运动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特别是在 20 年代本色运动推动下的教会合一运动。接着本文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促成 1958 年教会联合礼拜的历史背景和成因，包括三自爱国运动、神学院校的合并、社会对宗教的负面看法和各种政治运动等等。文化大革命期间，教会转入地下，真正打破了宗派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成立了基督教协会、出版了体现合一精神的《赞美诗（新编）》和《要道问答》，制定了《中国基督教教会规章》，肯定了教会内多元体制并存的状态，这些都有利于中国教会的合一。本文也分析了 8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教会在合一之路上所遭遇的问题，包括对三自的不同看法、宗派意识的复苏、教会内权力之争、灵恩运动的影响等等。最后本文指出中国教会所走的合一之路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联合会或联合教会，而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两会管理的合一模式。

[关键词] 中国基督教合一运动 联合礼拜

1958 年中国基督教各教派因各种因素的促成进行了合并，建立了不分宗派的中国基督教会，被称为走在世界基督教各教会的前列，提前使中国教会进入了“后宗派时期”。中国教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与中国文化包容性、中国基督教会总体上比较年轻、宗派主义不强有着密切关系，正如丁光训所言：“在中国，最初是把西方国家的许多宗派都搬了进来。但是，中国基督教的宗派历史毕竟是短的，宗派主义毕竟是西方的东西，中国信徒的宗派主义情绪并不高。这样，进

人今天这‘宗派主义之后’的时期并不过于困难，尤其因为整个环境不利于许多大体相同的团体的分立。”^[1]

事实上，一些老一辈的神学家，如贾玉铭在1921年根据中国文化的特点早就预言，基督教会的合一，中国教会将会走在前面。他说：“中国人对于宗教素抱一种齐物观，如儒释道之教理，虽迥然有别，然终能调和，使合而一。此种调和性，对于中华基督教会前途不无关系”，并预言：“将来我主之羊‘归为一群’之实现，殆自我中国始，而以中国基督教会为合一的先声”。^[2]

谢扶雅则结合中国文化进而对如何实施教会合一的方法作了很好的阐述：“西方基督教受了西方排他性的暗示，致使各宗各派互相倾轧而不相容。中国儒家崇奉‘大同’，大同不等于统一（Unity）或一律（Uniformity），大同小异，深知‘大同’必与‘小异’相连。我们不以‘异’之‘小’而抹杀它，亦不以‘同’之‘大’而拿来吞没一切。”^[3]

这些老一辈神学家的预言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会都被言中。

中国基督教的合一运动并非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其实早在上世纪初随着基督徒民族意识的增强，对西方教会给教会带来的宗派主义就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其中最突出的体现在20年代本色化运动中，合一运动构成了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会合一运动

世界基督教的发展史是一部分裂与合一相交融的历史。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的教派越分越多。与此同时，奋兴布

[1] 丁光训：“中国基督徒怎样看待圣经”，《金陵神学文选》（1952-1992），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92年，第11页。

[2] 贾玉铭：《神道学》，转引自汪维藩：“中国教会神学思考之特色”，《金陵神学文选》（1952-1992），第94页。

[3] 谢扶雅：《巨流点滴·历史综合时期》，转引自同上，第94-95页。

道运动往往有不分教派的倾向。特别是 19 世纪下半叶发起的第三次奋兴运动,大批青年人向第三世界传教,他们打着“我们这一代,要把福音传遍世界”的口号向非欧美国家派遣大量传教士,其中很多传教机构都是打破教派界线,带有合一倾向。实际上戴德生的内地会成立之初就有这种倾向。只是在其后的发展中本身也成为一教派组织了。在义和团运动之前,以传教士为中心的中国教会实际上是各差会自行其是的分散的教会。但义和团运动的惨烈促使信徒和传教士思考,开始了中国基督教的合一进程。

1. 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促使中国基督教开始有合一的意愿

义和团形成于 19 世纪末的山东,渊源于具有反清性质的民间秘密社团。后被清政府利用在直隶和山西等地得到发展。1900 年在清政府的错误导向下,拳民们在京城围攻使馆、教堂,并在直隶、山西、奉天、内蒙等省屠杀传教士与教徒,最终被八国联军的枪炮镇压下去,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其后果是教徒受祸之惨,平民受害之深,国家赔款之巨,都是空前的。据统计,在这场运动中被义和团杀死的天主教主教有 5 人,教士 48 人,教徒 1.8 万人;基督教新教教士 188 人,教徒 5 千人。而被八国联军屠杀的拳民则“为数实倍蓰于遇害的教民”。^[4] 事后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加上利息,如要全部还清,则高达九亿八千多万两,加速了满清政权的垮台。

但这一运动实际上成为基督教在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该运动的惨烈所造成的影响对中国信徒和传教士都是极其深刻的。

从中国信徒而言,义和团运动中信徒受难,以及其后列强们所索取的巨额赔偿等,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感情,一方面使他们意识到基督教如不摆脱洋教的地位,难以为国人所接纳,“教案迭起士民侧目”;另一方面对西教士对中国“索赔甚苛”也极为不满,开始有了“自传

[4]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3 年(第 4 版),第 241 页。

主道,自立教会的觉悟”。^[5]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02年上海的高凤池、王亨统、邬挺生、谢洪赉、宋耀如、龚伯璜等13名基督徒发起了中国基督徒会,提出以“爱国爱人之心,联络中国基督徒合为一群,提倡中国信徒宜在本国传道”。^[6]并于壬寅年(1902年)十月初十借慕尔堂召开中国基督徒会成立大会,出席者十分拥挤,说明自立精神深得人心。一时间全国许多省纷纷响应。中国基督徒会也可视为教会合一运动的先声,参加这一运动者不分教派,只要拥护自立者均可参加。此后中国各地的教会便开展了各种类型的自立运动。自立运动随着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信徒民族意识的增强而有所发展。

义和团运动对在华传教士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为什么洋教会造成这么多中国人的仇视?这不得不引起他们深刻的反思,由此传教士不仅更注意与政府搞好关系,不再直接干政,而且还较以往更注意信徒的质量,以逐渐改善与普通中国人民的关系。他们调整了传教的策略,从原来的直接传教为主改为间接传教为主,也就是以教育和医疗传教为主。间接传教本身就需要各差会的传教士有更多的合作,有利于合一运动的开展。

对教育传教的重视表现在:一是教会学校的教育在1900年之后不只是针对信徒子女而是扩大到普通民众生活中,而且在绝大部分的教会学校都是在1900年之后办的。1921年出版的《中华归主》一书中说:“教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较其他方面明显得多。1900年以前基督教教育的宗旨主要在于教育信徒儿童,现在它的范围就大多了,已经扩大到全国普通生活之中”,“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关于中学及高级小学的调查报告中所载264年学校中有74%是1900年以后创办的。”“如今已有14所教会学校列为大学”。^[7]一些差会利用庚子赔款在华创办学校,如山西浸会用此赔款创办了山西大学,美国各差会利用赔款

[5] 《金陵神学志》,1924年秋,第10卷第3号。

[6] 《中西教会报》,1903年,总91期。

[7]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第97页。

创办了清华大学，并设立了联合基金会，为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提供基金；二是在华宣教会派遣并培养了大量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从事教育工作。据统计，20年代时来华传教士及中国教职人员中有一半人从事教育工作。三是信徒的构成大量从教会学校中发展。据《中华归主》统计，“信徒教育程度的提高比全国人民的教育程度提高得快。全国平均每七十五人中仅有学生一人，而基督教团体中平均每三人中就有学生一人”。^[8]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基督教信徒的素质，而且为中国教会培养了人才。这些学生信徒一般而言较之普通信徒神学思想开放，有利于打破宗派观念，对基督教的合一运动有利。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各教派较以往合作意识增强，表现为教派内的联合，跨教派的全国性组织的建立，特别是在学校及医院的合作。

这种合作意识的增强表现在各差会的教派意识有所淡化。这从宗派联合方面可以看出。1907年传教大会上，传教士汲约翰就提出宗派联合的建议，得到了不少差会的响应。他们不再强调各自的不同之处，较注重联合。一是同一宗派系统内的联合，例如不同国家的圣公宗、信义宗、长老宗分别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总会。实际上，到20世纪20年代，在华的圣公宗、信义宗和长老宗都分别组成了各自的全国总议会（General Synod），或全国大议会（General Assembly）。另一类联合是跨宗派间的联合，如1907年大会上就通过了成立以省为单位的由各宗组成的省联合会。《中华归主》中谈到：“近年来，各地中国信徒和外国宣教师已逐渐承认各教派协和事业是基督教运动成功的要素。”^[9]

2.1910年爱丁堡传教大会的合一精神更促进了各差会与中国教会合作意识的增强

到20世纪初，一批年轻的教会已慢慢成长，自主意识开始形成。

[8] 《中华归主》(上)，第103页。

[9]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74页。

世界基督教界也意识到这些教会的力量不可小视。这些教会显然在很多方面与欧美教会不同，要充分发挥他们在本国或传教区的传教使命，由此提出了本色教会的思想。由于这些教会并没有强烈的宗派意识，他们也不希望传教士把这些分裂带给他们。面对这种情况，世界基督教界意识到传教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就体现了这种合一精神，并提出了本色教会议题。该会议提出“各差会单独活动而能够完成宣教使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应开始重视世界各国传教地区教会的作用，推行本色教会运动。该次会议上中国教会领袖诚静怡崭露头角。他的七分钟发言代表了中国信徒首次向西方教会表达他对中国教会自立的观点，强调了中国教会的重要性，批评了差会带给中国宗派和宗派主义，公开宣称“我们中国基督徒对你们的宗派主义毫无兴趣”。这句话以后为中国教会界常常引用，成为经典话语。为了更好地贯彻本次大会精神，会议成立了续行委员会，诚静怡作为中国代表当选为委员。这是中国教会在国际教会界首次展示自己的风采。

爱丁堡会议之后，年轻的中国教会便努力实施从差会向教会过渡，这需要中西教会合一、合作。诚静怡1912年在《国际宣教评论》第3期中就提出了这个主张。^[10]他说，一是目前中国教会处于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的一切工作应以中国教会为中心；二是过渡阶段中西教会要合一、合作而不是分离、对抗。实际上，这两点成为中国本色教会运动的基本态度。

1913年，爱丁堡会议后当选为第一任续行委员会主席的美国布道家穆德来华访问，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使各国传教士及中国职员们更加深信，正在成长的中国教会团体要想成功地应付教会在各方面遇到的问题利用目前的时机，最根本的是要有明确的统一计划

[10] Cheng Ching-yi, "The Chinese Church in Relation to its immediate Task,"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Vol. 1, No.3, 1912, 383.

和有效的合作”，^[11]而“要想明智地制定一个有效的发展计划”，就需要全面地了解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为此，1913年的全国基督教会议根据爱丁堡会议模式成立体现合一精神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大会选举中西委办共51人，中西各选择一名干事。中方干事为诚静怡，西方干事为罗炳生。

中华续行委办会在此后几年中为合一运动做了几件较为重要的工作：

一是通过了“睦谊协约宣言”。

为了协调在中国传教的各差会、教会、各宗派联合团体和差会联合团体之间的关系，1917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的第五次年会上，作为委员会主席的何斯德递交了一份中国的《睦谊协约宣言》。该宣言仿照印度在1915年和1916年所通过的《睦谊协约宣言》，对在华的各宣教团体之间在合作事业，包括教育、医药、文字事工等方面的合作，以及个别事业上的相互关系，本着“互相谅解和公正待人的精神”，“阐述睦谊的各项原则和这些原则在中国基督教事业上的应用”。^[12]该宣言中包括如下内容：仲裁与调解、区域协议、差会或教会聘用职员的调动、差会聘用人员的薪水、关于对待受处分的差会聘用人员、教会与其他教会教友的关系、洗礼和入教、关于对待受处分的教友、仲裁机构中的中国代表等九个问题，并作了详细规定。经各教会和差会讨论，“收到宣言的173个差会团体中有108个已采取了相应的行动，……约占整个宣教师团体的75%”。^[13]应该说，在宗派林立的年代，能有这么多宣教士都赞同并遵守这一宣言中的协议，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二是推动教会教育和医疗事业上的合作。

中华续行委办会成为推动中国基督教各派合作的中枢力量。在

[11] 《中华归主》(上)，第5页。

[12]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76页。

[13] 《中华归主》(上)，第99页。

它的推动下，体现合一精神的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和中华博医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北京协和医药专门学校及其附属医院，在中华博医会（罗氏医社）的推动下促进了中国的医疗制度与其它团体的合作。《中华归主》提到“罗氏医社最大的贡献是重新组织北京协和医学院，这项工作包括组织一支庞大教师、护士和行政职员队伍，一部分人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各医学团体征募，一部分人从中国教会医院有相当丰富经验的人中征募，现在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14]

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和医院由两个以上的不同差会或不同宗派合办的机构就有 58 所。1919 年 10 月组成的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其宗旨是“要在解决高等教育问题上寻求联合一致的努力”。^[15]发起联合会的教会大学是在华实力雄厚的十四所基督教大学，不久北京协和医学院也参加。

神学教育中也有联合的倾向：一种是由同一教派的两个以上的宣教会合办的，如无锡的圣公会神学院，是由英、美、加（拿大）等国的圣公会合办；另一种是由不同教派的宣教会合办的，当时已有七所。^[16]

三是推动教会社会事工的合作。

中国各教会之间在社会工作方面也进行了不少合作，如当时组成的“妇女节制会”，反对嫖娼，帮助妓女从良。另有国际拒土联合会，从事禁烟的活动，他们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这些组织均不分教派。^[1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1910-1912、1917-1918、1920-1921 年期间安徽、浙江、华北分别遭遇灾荒，在赈灾事业中，中国基督教与天主教进行了合作，“在工作中大家消除教会门户之见，共同协作”。^[18]这种状况在以往是不多见的。

[14] 《中华归主》(下)，第 996 页。

[15] 同上，第 934 页。

[16] 《中华归主》(中)，第 674 页。

[17] 《中华归主》(上)，第 100 页。

[18] 同上，第 96-97 页。

四是发起对华基督教各项事业的调研和“中华归主运动”。

为了了解基督教在华情况，中华续行委员会自1913年起就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基督教的各项事业进行全面调查，此项工作动用全国各差会的力量，进行了为时七年之久（1913-1920）的调研。1921年续行委员会完成了对中国基督教会现状的全面调查工作，用中、英两种文字编写了厚厚的调查资料集《中华归主》，对人们了解在华基督教事业大有裨益。

中华续行委员会执行部还在1919年12月在上海新天安堂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组织“中华归主运动”，参加者有117人，中西代表各半。“赴会的人，国籍不同，宗派不同，所作的工夫也不同，但是大家一心一意地谋求一种联合进行的作为，藉以彰显基督确能救国，确能改正人心，确能使中国化险为夷、转祸为福。”^[19]会上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教会职员应如何协力合作及如何成就工作”。^[20]1920年中华续行委员会成为中华归主运动的中央机关。为配合这一运动，委员会将会员中的华人比例由原有的1/3增至1/2，并认可中华归主运动委员会总干事由华人担任。这一运动不仅为消除在华各宗派之间纷争作了努力，并且在培养中国职员和提倡信徒服务教会和服务社会方面都有所发展。

但中华续行委员会只能作为临时性的全国性的机构看待，它终究不是教会的正式代表机构，任务完成后，其生命也便要结束。而当时的中国基督教又是如此庞大的一个事业，没有一个全国性机构来协调则难以为继，因此必须举行全国性大会以产生这一机构。因此中国基督教会和差会便定于1922年召开一次全国基督教大会。

3.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对中国基督教合一运动的推动

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正式发起了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合一运动是本色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本色化运动发起的同时，

[19] “致全国同道书”，《中华归主：中华归主运动通告书》，第一期，1920年1月10日，第1页。

[20] 全绍武：“中华归主运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卷，1921年，第45页。

也推动了中国教会的合一运动。本次会议体现的合一精神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突出华人信徒的作用。

这表现在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华人所占的比例是历史上这类会议中比例最大的。本次会议共有代表一千多人, 中西各占一半, 代表中国 130 个教派, 40 万基督徒。大会还选举了中国人诚静怡为会长, 各分股及分组讨论会的负责人也有不少是由中国人担任, 更重要的是会议的主题定名为“中国教会”。这种新气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基督教会日趋成熟, 教会工作的重心正从“宣教会移到中国教会”, “从宣教师转到中国信徒”。^[21]

全国大会之“五股中第三股关于‘中国教会的使命’应完全由中华国民独自担任, 不派西教士合作”。^[22]“西人不得过问, 不得干预。”^[23]这一做法本身就是为了避免宗派主义。正如刘廷芳所言, “西教士深受宗派主义影响, 不容易摆脱旧的思想习俗, 而华人则没有这一宗派历史, 由华人讨论此事可免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

二是批判宗派主义, 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基督教会”

与会代表, 不论是中方还是西方代表都表达了合一的愿望, 特别是中方代表这种意愿更为强烈。他们都对宗派主义进行了批判, 认为这些都是西差会带给中国教会的弊端。例如诚静怡对传教士浓重的宗派意识提出批评, 提出中国教会必须联合的要求。简又文提出“民族的教会不是分裂的教会, 乃是合一的教会”, 即反对宣教会造成的宗派主义。^[24]贾玉铭认为中国人的国性中就“有调和的特长。”“如果注意到中国人固有之特性与专长, 能发扬广大, 则中华基督教会的前途无量”。^[25]赵紫宸也对教会的宗派主义提出批评。他认为造成

[21] “基督教全国大会的各问题”, 《青年进步》, 第 52 册, 1922 年 4 月, 第 59 页。

[22] 刘廷芳: “基督教全国大会”, 《生命月刊》, 2 卷 3 册, 1921 年 10 月, 第 2 页。

[23] 同上。

[24] 简又文: “民族的教会”(上), 《青年进步》, 1922 年 4 月, 第 41-44 页。

[25] 惺吾(贾玉铭): “今日之中华基督教会”, 《金陵神学志》, 1922 年, 第 8 卷第 1 期, 第 23-25 页。

中国人对基督教误会的原因有许多是根据“洋教”二字而发生的。而“‘洋教’上面，再加上宗派与宗派主义，基督教的西洋色彩于是乎更加浓重了”。^[26]刘廷芳在发言中也特别提出“中国基督教必须竭力主张统一”，反对欧美的“四分八裂”，“绝对不容人造的宗派”在中国的基督教会内滋生等等。^[27]

会议最后一致同意把中国教会定名为“中华基督教会”。最后通过的《教会宣言》完全是由参加第三股的中国教会人士独立研究讨论的结果。该《宣言》关于“统一的教会”这一节中，强调宗派主义是西方教会历史造成的，与中国信徒没有关系，西方传教士将宗派传入中国，“宗派主义，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感人的动力，而实为教会中纷乱、扰惑、失效的主因”，“今日中国急切地需求基督的救法，并确信惟统一的教会，才能拯救中国。因为事工浩繁，教会如无坚固的统一，断难得充足的力量，以应此等需求”。^[28]

三是大会通过《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宪章》，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1922年全国基督教大会通过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宪章》，其中提出“要培养与发扬中国基督教会的交通和统一精神；并要求达到中国的基督教与全世界基督教会统一的精神”，“要使教会领袖不论中西，在何处，属何公会，能彼此认识，尊重，信托，并辅助教会种种协办的事情，和协和的计划”，“要筹备特别祷告的时期；组织布道的运动；筹备聚集大会的种种事项”；“要组织一个调查问讯处，调查全国教会一切事情”；“本会应当将基督教教育会、中华基督教博医会、中华卫生教育会及他种专门机关联为一气”；“筹备并召集下届基督教全国大会”，^[29]等等。

[26] 赵紫宸：“中国教会的强点与弱点”，《生命月刊》，1923年1月，第3卷第5册，（著论）第1-8页。

[27] 刘廷芳：“中国的基督教会”，《生命月刊》，1922年6月，第2卷，9-10期，第1-10页。

[28] 邵玉铭编：《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正中书局，1980年，第519-520页。

[29] 《中华归主》，1922年6月10日，第23期，第3页。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协进会宗旨有二：“（一）要使全国教会与教会内各种机关有统一共济合作精神。（二）使中国教会成为本色的，自立的、自养的、自传的、自动的教会。其性质是：协进会虽是代表全国教会，却没有独断独行的权柄，它的用意是要造成一个共济合作的团体。”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的任务是“1、培植和表扬中国教会的合作精神。2、注意研究中国教会的自立、自治、自传的进步，设法使得教会早日合乎华民的性质和环境，并且提倡一切运动方法，使得迅速完全自立。3、用全国眼光研究中国教会种种的需要，计划如何使中国得福音的化导，提高教会的灵育，筹备全国祈祷会，组织布道运动会，召集大会，随时培植教会灵性生活及布道的精神。4、提倡化除各教会领袖的界限，使他们互相新生彼此信托，培植长于全国问题及国际问题经验的领袖人才并求中国教会与外国教会互相连络。此外还有数种职务，俱不外乎联合教会共求达到天国临世的目的等种种方法”。^[30]

实际上，该次大会把合一运动与中国教会本色化密切结合。中国教会的《宣言》中说：“吾们相信在根本上中华信徒都有统一的实在——我们放胆地希望中国教会统一之后，可以激励西方信徒，使西方分裂的教会，也得以早获统一”。这说明合一本身正是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的一个特点。中国教会实施了合一，能对世界基督教会起到表率作用。所以，中国教会的合一与世界基督教事业有直接的关联。

王治心对这次大会作了很好的总结和概括，对会议本身最为肯定的有两点。一是教会合一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教会原本无门户之见，但受西方宗派的影响也有了宗派主义，中国信徒认为无保持宗派的必要。这次会议集合了130多个教派，推动了合一运动，发表了共同宣言，中国教会实现宣言中的“合而为一”的这一预言将为期不远。二是“中国教会”，也就是“中国本色教会”，中国“化”的教会。对为什么要“本色化”，他的解释是：这“可以表明传教在中国，必须把原来

[30] 范玉荣：“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女青年报》，1922年12月，第11-12页。

的西洋仪式——组织——改变过来，叫他合乎中国的特性，成为中国的土产，不是一种舶来品，既然叫他中国教会，中国人应当立在主人的地位，样样事体走上前来担负责任，不要落在西人之后，反主为客；而西国的朋友，因此也得了一种很大的觉悟，中国教会迟早要交给中国人手里，他们终是一个宾客，不应当长此把持”^[31]。从他的这一评论中可以看出，基督教的合一与基督教的本色化（中国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4. 1922年全国会议之后，合一运动的继续

这次会议之后，不少教会杂志有关教会合一的讨论文章相当多，对合一提出了各种建议和方法，进一步推动了基督教合一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继续推进多种形式的合一。

根据诚静怡 1925 年对这一时期基督教合一的研究，当时中国教会“联合之方法甚多，联合之心理不二：有主张统一同宗教会为一大团体者，如中华圣公会，长老会总会，中华信义会等。有主张统一同城同市之不同宗教会为一大团体者，如广东闽南中华基督教会等。有主张教会完全由中国人主持，而不加宗派之差别者，如华北中华基督教会。有主张教会不求统一而在公共问题为一致活动者，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及各省区城市之基督教协进会（或称联合会）。有主张教会专门事业为不分省界会别之合作者，如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博医会，卫生会，主日学会等。以上种种主张，各有其用，惟表示教会人士之决心联合则一。”^[32]

随着“非基运动”的发展，中国基督教的合一运动也有所发展。“五卅”惨案和大革命运动中一些中国基督徒深刻认识到差会带来的纷争给中国教会带来的危害。在危难的局势下，中国基督徒必须团结起来，摆脱差会的控制，走自立之路。许多地区的中国基督徒都建立

[31] 王治心，“聚过基督教全国大会以后”，《神学志》，1922年夏，第8卷，第2期，第3-4页。

[32] 诚静怡：“本色教会之商榷”，《文社月刊》，第1卷，第1册，1925年10月，第6页。

起不分教派的合一组织,如杭州中华基督徒联合会,开封中华基督徒会,衡阳中华基督教联合会、云南中华基督徒联合会等。

二是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会总会。

所有这些联合中,最大的联合则是于1927年10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中华基督教会总会。该会“代表12个大会,51个区会,529个教堂,2091个布道所,按立牧师333人,传道士2405人,受餐信徒120175人,约占全国信徒1/3,占地20行省,融化16个宗派:自立教会、美丹瑞会、基督同寅会、美国公理会、伦敦会、纽丝仑长老公会、美国北长老会、美道会、英长老会、荷兰归正会、美国南长老会、德国归正会、苏格兰福音会、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英浸礼会”。^[33]由诚静怡任会长,许声炎任副会长,文书为张坊和邹秉彝。他们都是华人。只有总干事为西人高伯兰,高伯兰曾恳辞,认为应由华人担任为宜,但最终大会仍推举他任此职;又举范定九为协理。从中华基督教会总会领袖人物的组成看,显然华人占绝对优势,只吸收了个别西人参加,这表明了人员配备上的本色化。

该总会的前身是于1922年全国大会后成立的中华基督教会临时总会。1925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临时总会事务所。又经过了两年多的筹备工作,终于建立了正式总会。

据大会精神,中华基督教会的定义是:“由中国信徒根据正宗的信仰,自动而组成的教会,不倡宗派,不分国界,惟求适合中国的国情,应付中国的需要。”^[34]并认为:“中华基督教会总会,因感觉在中国教会的西洋色彩过于浓厚,所以毅然决然的提倡本色化,以期与我国固有的文化适合融会。又深悟宗派的束缚,使本为一体的同道分门别户,所以勇敢的实行合一运动。宗派的界限不打破则永无本色化的希望,精神和组织的合一不推行,则宗派之见终难消弭。所以从组织方面而言,中华基督教会的一个大旨趣,就是在中国实现一个纯全中国本色

[33] 高伯兰:“中华基督教总会概述”,《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三),第10卷,1928年,第1页。

[34] 同上,第2页。

化和合而为一的教会。必要如是，教会才可安稳的建立在磐石！”^[35]

尽管很多中国信徒走合一和本色之路的热情很高，但当时中国教会中只有部分达到完全自养自立的程度，由此也影响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合一的中华基督教会。因此有人指出：“教会当前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养。凡是一个团体其经济不能独立，终难实现它的自动和理想生活。中华基督教会要想名实相符，第一当谋自己经济的充裕，至少也要办到不长久仰赖西差会的供给”。^[36]实际上，自养这个问题对中国教会来说始终是个难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也未能真正做到。

上述中国基督教合一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建立了合一的中华基督教会，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信徒都团结在这一教会组织之内，这是很不简单的事。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建立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虽然它只是全国一些主要宗派间（并不包括中国全部教派在内）的松散联盟，但它召开的年会、形成的决议、发起的运动，对大多数中国教会都产生影响，例如30年代发起的“五年奋进运动”、“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运动以及40年代的“三年奋进运动”都是如此。这些都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基督教走联合之路起到铺垫作用。（待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35] 同上，第7页。

[36] 同上，第4页。